

「中國宗教與社會高峰論壇」記要

姚西伊

2008年10月8至10日，「中國宗教與社會高峰論壇」在北京大學舉行。該論壇由美國普度大學（Purdue University）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和北大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、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中心合辦，美國約翰鄧普頓基金會（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）資助。會議吸引了中外一百多位學人與會，可謂近年來中國宗教學界的一件盛事。

這次會議召開的背景是，自1978年文革結束後，宗教學終於在中國大陸得以恢復以來，迄今已發展三十年，越來越多學者感到有必要做出全面的回顧，總結得失，並對未來的發展做一些展望與規劃。而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迅速提高，中國宗教學研究的成果和宗教狀況也引起了國際宗教研究界的關注。因此，會議的目的在於集中國內外宗教學界有代表性的學者，群策群力，把對中國宗教的研究推上一個新台階。用會議最主要的組織者、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楊鳳崗教授的話來說，「就是希望回顧我們已經做了哪些、取得了哪些成績？更重要的是討論未來數年應該往哪些方面使勁、能做什麼？」（「中國宗教與社會高峰論壇籌備會議，2008年5月24日」，見www.purdue.edu/crcs/

itemconference/2008beijingsummitc/planning_meeting)

會議邀請了國內外著名學者三十人，加上其他來自國內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者，共提交了論文近八十篇。論文所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，除了本次會議的重點範疇——宗教學、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外，尚有大量關於當代儒、佛、道和基督宗教的探討。與會之後，筆者有以下幾點觀察：

(一) 當代中國宗教學的轉型與困難。改革開放之後的二十多年，中國宗教研究的主力是文、史、哲背景的人文學者，研究的進路也就帶有相關的特點。九十年代末期以來，宗教社會學、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才開始出現。自2004年以來，在美國受宗教社會學訓練、並長期在這一領域任教的楊鳳崗博士，積極在國內推動對宗教的社會科學研究，通過辦培訓班培養人材，並聯合國內學者開展研究專案，成果蜚然。可以說，對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的異軍突起，打破了人文學進路一統天下的現象，是近年來中國宗教學研究界的一個突破。本次會議即是這個大趨勢的表現與深化。參與本會的國外學者中，至少有一半是宗教社會學和人類學家，如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**Eileen Barker**，加州大學的**Richard Madsen**和波士頓大學的**Robert Weller**。他們發言的共同特點，是運用歐美社會科學界的理論和概念，探討中國的宗教與社會問題。這個特點在中國學者中也有突出表現，探討社會學理論與報告調查結果的不在少數。例如，復旦大學社會學系**范麗珠**教授在發言中認為，把西方的宗教理論引入中國之後，產生了一定的困難，因此，有些西方的概念需要予以調整。她的觀點引起了部分中國學者的共鳴。參與由楊鳳崗主持的一個研究項目的五位學者，發表了他們對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蘭教、佛教和道教商人的初步調查結果。甚至當代大陸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、中國人民大學

教授康曉光，近年來也主持開展了一項對當代傳統文化復興現象的調查訪談研究，以摸清復興的成因、規模和組成人員。筆者感到，對於關心和從事大陸事工的教會人士來說，這類實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資料，可以成為非常有幫助的工具。例如，來自零點調查公司的袁嶽發表了〈2007年中國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調查〉的結果，是筆者看到過的，對轉型時期國人精神信仰狀態最為全面的一個報告，有些資料肯定可以矯正不少海外人士對中國社會的成見，有助於思考和制訂未來的中國事工。

（二）這次會議的組織者在9日晚上，舉辦了一次關於儒家的公開講座。由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以「當代中國的儒家精神」為題，做了主題演說。「波士頓儒家」的兩位代表人物——南樂山（**Robert Neville**）和白詩朗（**John Berthrong**），以及康曉光也分別發言。當晚的講座吸引了大批聽眾，演講大廳坐無虛席，連通道也站滿、坐滿了學生。杜維明認為，植根於近代西方啓蒙運動的世俗人文主義帶來的後果，既有正面，也有負面。而儒家的人文主義由人類經驗的四個維度構成，不同於世俗人文主義。儒家在當代世界處於一個很好的位置，既可以對啓蒙運動思維予以同情性理解，又對之進行批判性反思。杜的演講引起了聽眾的熱烈反響。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，杜在演講中所表現出對基督教傳統的開放態度。他坦誠地表示，多年與基督教神學家的交往使他學到很多，也幫助他更深刻地認識儒家傳統。如果基督教發展的好，完全可以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資源。再加上南樂山和白詩朗這兩位對儒家非常欣賞、素有研究的基督教學者的回應發言，這場活動成為了一場儒家與基督教傳統的對話，使人對兩大傳統在未來中國的關係頗感樂觀。近年來，大陸儒家的復興如火如荼，某些領軍人物對其他傳統，特別是對基督教的態度咄咄逼人。但是，這場演講令人感受

到不同的氣氛，也提醒我們注意當代儒家運動中的多樣性和可能性。

(三) 這次會議上，有些發言涉及學界對國內某些實際宗教現象、問題和政府相關政策的觀察、思考與建議，頗能反映當前國內宗教生活的動態。實際上，在今年5月24日在北大舉行的，這次大會的籌備會議上，與會的十七位學者當中，就有人發表了一些相當值得注意的言論。譬如，北大社會學系前主任**馬戎**認為，有關政府部門在藏民和維吾爾族中所實行的某些政策考慮得很簡單，客觀效果也很差，很大程度上是這些部門對宗教的無知造成的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**沈原**指出，北京家庭教會很多，社會與政府都不能再忽視其存在。中國人民大學**何光滬**指出，內地對天主教和新教所採取的作法，其實違背了兩教的基本特點。北大宗教學系**孫尚陽**以中國反邪教協會為例，呼籲宗教政策不應該由反宗教的人來制訂，至少應該由知曉宗教者來制訂。(會議記錄全文見前引網址)

在十月的大會期間，社科院宗教所所長**卓新平**在發言中，從七方面闡述了中國當代政教關係的複雜交織和相互張力，例如，中國政治在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文化之間的徘徊，「政教合一」與「政教分離」的混雜，「跨國宗教」與「教隨國定」的張力，等等。他認為，宗教的迅猛發展已衝破了現有的法律界限和社會認可的秩序，導致各個相關層次上政教關係的現實緊張和認識困難，對此所可能產生的後果，目前分歧頗大。他指出，中國社會文化對宗教的偏見，導致中國經常成為國際政治的批評對象。因此，他呼籲對宗教要恢復人類共有的正常認識，這樣，有些糾纏不清的問題應可迎刃而解。卓所長的發言可謂高屋建瓴，對幫助我們認識當前中國社會宗教錯綜複雜的處境極有幫助。除此之外，多位講員指出，中國政府目前只承認五大宗教（基督教、天主教、

佛教、道教、伊斯蘭教），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。

（四）這次高峰會議的另一突破，在於舉辦了一場關於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的公開講座。眾所周知，自改革開放之後，家庭教會發展迅速，規模日益龐大。但主要由於政治原因，這一現象在內地成爲一敏感話題，幾乎沒有人公開討論過。故此次講座得以公開舉行，實屬不易，意義不小，亦無怪當日吸引了大批聽眾前來聽講。主講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**于建嶸**研究員，講題爲「基督教家庭教會向何處去？」數年前，于曾因揭露和研究中國農村的危機，引起了中央和社會的關注，之後他一直在基層做調查，關注維權等社會熱點問題。近年來，他開始注意到家庭教會的迅速發展和廣泛存在，陸續發表了一些訪談和講座。在演講中，于認爲：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經歷了地下傳教、團隊式家庭教會、獨立地方教會等三個發展階段。目前，相對封閉的、金字塔式結構的家庭教會已經不是主流，更加開放、彼此平等獨立的家庭教會正在成爲主流。由於政府不接受家庭教會獨立登記，家庭教會的法律地位不明確，致使教會領袖和普通信眾有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，影響家庭教會正常發展。與此同時，由於家庭教會的法律地位不明確，相關政府部門在管理時無法可依，採取的行動不一定有利於讓家庭教會與政府部門建立正常的關係。另外，由於家庭教會沒有明確的法人地位，教會內部存在發生財產糾紛的隱患。基督教家庭教會的發展方向理應是明確合法化和進一步公開化。他呼籲政府改變對家庭教會的「駝鳥政策」，承認家庭教會的合法存在，允許它們在「三自」系統之外登記和自辦神學院。

對他的演講做回應的，是社科院宗教所的**高師寧**和美國研究所的**劉澎**。這兩位也是對家庭教會有極深瞭解的學者。高在發言中分析了家庭教會在城市內的發展，指出城市家庭教會的一些新動向，如從隱蔽走向公開，社會服務意識參與

意識增強，等等。她認為，家庭教會今後在進一步強化社會參與的同時，應關注傳統文化的回潮，理清與其他宗教的關係。劉則認為，內地現行對家庭教會的典型定性和思維以「西方滲透」為主要特點，相關政策也以「反滲透」為主調。這種錯誤的思維和政策，無視家庭教會的產生和成長主要來自中國內部因素的事實，導致了宗教管理的無效，以及政府與教會在登記問題上的僵局。從調查反映的事實看，家庭教會是自發的群眾性的宗教組織，不是政治團體，也不是反社會組織。家庭教會的信徒是人民群眾，是愛祖國、守法紀、講道德、有愛心、能自律、善服從的群體。因此，不應再用敵我鬥爭的眼光視家庭教會為威脅政權的力量。如果開放宗教市場，實行政教分離、鼓勵遊戲者參與制定遊戲規則，建立鼓勵宗教進入社會服務領域的准入與監督機制，家庭教會問題應該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，家庭教會將會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力量。關鍵還是要改變不適應的管理體制，完善宗教方面的立法。

劉澎還在大會上發表了以「關於宗教進入社會服務領域的機制問題」為題的報告。他認為，目前在中國大陸，宗教團體辦社會慈善和服務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，而是如何能夠的問題。由於現行政策法規的缺陷，再加上政府對宗教的防範，這個問題尚未得到很好的解決。很多宗教團體做了大量救災工作，卻不能打出宗教的名字，沒有「名分」。他主張，必須通過完善有關法律，建立一套保障宗教能順利進入社會服務領域，發揮積極作用的機制。從是次高峰會議所透露出來的這些動向來看，中國大陸的宗教生活十分活躍，其影響正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擴大，而宗教研究也十分活躍，即使是在相對穩定的政府政策和政教關係格局下面，也是暗流洶湧，變化的到來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。